

我的
经济理论
哲学思想和
政治立场

(第三版)

马寅初◎著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我的
经济理论
哲学思想和
政治立场

(第三版)

马寅初◎著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 / 马寅初著. —3 版.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 - 7 - 5095 - 6875 - 0

I. ①我… II. ①马… III. ①社会主义经济 - 中国 - 文集
IV. ①F120.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68798 号

责任编辑: 张怡然

责任校对: 杨瑞琦

责任印制: 刘春年

版式设计: 兰 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cfeph@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142

营销中心电话: 88190406

北京时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80 × 1230 毫米 32 开 7.375 印张 135 000 字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32.00 元

ISBN 978 - 7 - 5095 - 6875 - 0/F · 5525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本社质量投诉电话: 010 - 88190711

打击盗版举报热线: 010 - 88190492、QQ: 634579818

第三版说明

作为当代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的经济理论对我国经济、教育、人口等方面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是其在新中国成立后撰写的主要著作之一，于1958年2月出版，1980年5月再版。

在书中，马寅初先生从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出发，论述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和人口问题等。

本书出版后，便引发热议，其中收录的《新人口论》更是在过去的50多年中一直饱受争论。马寅初先生的命运也因此历经起伏。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待一切争议被历史尘封以后，我们特再版这部著作，回顾马寅初先生的经济理论与哲学思想。相信本书的再版将有助于广大读者重识马寅初，了解他对我国经济、人口政策的影响，从而进一步厘清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脉络。

此次再版，对个别文字疏漏以及数字格式进行了修改，原著内容及结构均未作改动。

2016年7月

目 录

此书各篇论文内在联系的说明 / 1

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 / 10

一、要加速农业发展必须认识水利与肥料的重要性 / 11

二、其次谈谈肥料问题 / 15

三、从化学肥料的重要性到化学肥料厂的设计 / 17

四、从化学肥料厂的设计到奥妙的学得 / 18

五、从奥妙的学得到试制的成功 / 19

六、从试制的成功到成本的大大减低 / 22

七、在生产成本的降低中遇到了若干限制 / 24

（一）棉花不足可不可以多进口一些的问题 / 26

（二）棉花不足可不可以用别种纤维补充 / 29

（三）原材料供应不足，可不可以多生产一些的问题 / 31

（甲）一般工业的原材料问题——煤 / 31

（乙）特殊工业的材料问题——电子管厂的材料 / 33

（四）各种优质钢材，我国尚不能自制，可不可以
进口一些的问题 / 35

八、在这些限制克服中，自然会更进一步地改变社会主义
建设的面貌 / 36

（一）从发展的观点谈平衡理论 / 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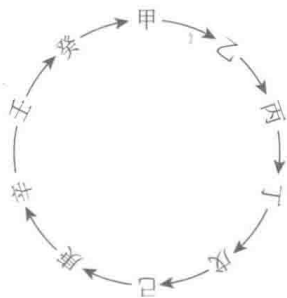
(二) 从发展的观点谈哲学思想 / 51	
(三) 宋明程朱派作出“理在事先”错误结论的根源 / 54	
九、这个新面貌将很明显地反映在对外贸易上 / 59	
(一) 一方面向来的入超将永远变为出超或出入平衡 / 63	
(二) 保护政策 / 66	
十、失业问题：甘愿失业、不甘愿失业和救济问题 / 68	
十一、凯恩斯从“营救资本主义”观点出发写出一般理论 / 72	
十二、赤字预算 / 84	
十三、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管理下贯彻执行统购统销政策 / 86	
结 论 / 89	

附 录

联系中国实际来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 / 95	
联系中国实际来再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 / 123	
新人口论 / 152	
我国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177	

此书各篇论文内在联系的说明

我到北京大学之后，学了俄文，读了几本俄文著作，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又读了毛主席的《矛盾论》与《实践论》（中文本）。读了这几本中俄文著作之后，我脑海中出现了两个疑问：第一，斯大林书中和政治经济学中所说的经济发展规律（如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规律）是否在中国已经实现？要研究这个问题，不能专靠俄文的经典著作，必须把国内各方面的社会经济活动，切切实实地研究一番，分析一番，而后方可回答这个问题。第二，唯物辩证法和毛主席的矛盾论告诉我们宇宙内的事事物物都有内在的联系，都不是孤立的。譬如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环节于此，各个之间都有内在联系，故甲与乙、乙与丙、丙与丁、丁与戊、戊与己、己与庚、庚与辛、辛与壬、壬与癸皆有联系，最后癸与甲（第十与第一）也必有联系，结果形成了一个圆圈。



这就是团团转的联系。我心中自问，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个环节能不能这样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圆圈？若把以上两个疑问并成一个问题，就等于按团团转的比

例发展规律，把所有主要环节联系起来，综合平衡起来，能不能成功？不妨试一试，再看其结果如何。这就是中国计划经济的本质，所以还要联系中国的实际情形，否则不切实际，成了空谈。1955年初，我的脑海中充满着这种想法，但这种想法对与不对，非以实际情形来证明不可。我就下一个决心来试写一篇或两篇平衡论，命题为“联系中国实际来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成功与否虽无把握，然信其有成功之可能，苟不然者中国的计划经济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也。但正在写作中遇到了三个障碍：工商业于1955年尚未全行全业实行公私合营；许许多多私营工厂尚停留在加工订货阶段；公方尚站在私营企业之外；企业与个人的改造虽难贯彻但一定要贯彻；资产所有权仍在私人手中；私营工厂对交货期限、货品的数量和质量，往往不照合同执行，对于计划经济造成很大的困难。此其一。农业合作社于1955年初，可说全是初级社，不仅基础不巩固，而且发展中的变动亦很大，应不断地加以观察和研究，如果农业合作化中的统购统销一部分办得不好，计划经济就要受到挫折。此其二。计划经济的目的在把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提高劳动生产率，借以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但中国人口如此之多，而生殖率又如此之快，要加速工业化，不甚容易，如何是好？此其三。因此要写平衡论一定非把这三个问题搞好不可，非把四个有联系的问题：平衡论、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人口论，同时抓起来不可。《我国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文开始于1955年1月，完成于1955年4月底，当时我预见到党和政府本一贯的政策对民族资产阶级，迟早一定采取和平改造的方式，而且一定采取逐行逐业改造的方式，把工业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改为公有制。事情演变至1956年春，我所主张的全行全业

合营，果然完全做到，我的预见变为现实。但这篇 1955 年的文章因我的朋友说我有庇护资方之嫌，竟搁置两年多，始于 1957 年 8 月终发表。

《农业合作化》一书，于 1956 年带助手一同到杭州住了几个月写了八章初稿，还有八章至十二章因农村经济情况变动很快；在变动的情况下，很难写出一本有固定性的、长期适用的专书。但我深信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培育之下，代表着新的生产力的农业合作社，只要有正确的领导，一定能够不断地成长发展，故拟待至明春（1958 年春）下乡继续写下去，期于 1959 年初出版。同时 1956 年在杭州写作时，抽出了一些时间，把平衡论的初稿加以修改补充，写成第一篇，于 1956 年 12 月 28 日、29 日两天的《人民日报》发表。回京以后即着手赶写第二篇，于 1957 年 5 月 11 日、12 日两天的《人民日报》发表。

1955 年《我国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文完成后，即着手准备人口问题的发言稿，打算在 1955 年的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但在浙江小组会上讨论时，好多代表不同意我的看法，且竟有人认为我所说的是马尔萨斯的一套。虽然他们的意见我不能接受，但都是出于善意（那时会上空气不适于提出这样的问题），故我自动地把发言稿收回。今年（1957 年）时机成熟，遂把发言稿在人代大会上提了出来。全文登载于 1957 年 7 月 5 日的《人民日报》。发表后，接到各地人民来信 40 余封，几无一不赞成我的主张。我的人口论与马尔萨斯学派完全不同，他们主张以瘟疫、疾病、战争等残酷的手段把人口削减，而中国的马尔萨斯者竟主张把中国人口削减至两亿左右，我则不但不主张削减而且要提高劳动人民的劳动生产率，借以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我只主张把还没有生出来的人口，用避孕的方法控制起

来而已。

以上是关于经济理论方面的，比这方面更重要的是哲学思想方面。宋明程朱一派哲学家所讲的“理”似乎是指自然规律而言，虽然他们的“理”也含有道德原则的意义。程朱派认为“理”可以离事物而独立存在，故说“理在事先”或“理在事外”，这是唯心的说法。我在这里所说的“理”，如综合平衡的“理”、按比例发展的“理”也是指自然规律而言，但是这个“理”不能离开事物而独立存在。“理”即在事物之中，离开了事物无所谓“理”，故说“理”在事中，这是唯物的说法，而且这个“理”是团团转的，因为宇宙中所有事物都有内在的联系，都不是孤立的。在第一篇平衡论结尾中，我把团团转的意思说得很明白，在第二篇平衡论的结论中，我把“理在事中”的意思表达出来了。

但这两篇平衡论中团团转的“理”无非在平面上转动而已，就如孔子所说的“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年年如此，看不出有发展的意思。但是我们的经济是发展的，从低级发展到高级的，自下而上的。年年增产，国民收入增加；积累愈多，生产再生产的范围愈广，国家愈富，团团转的平衡和按比例的发展，就从低水平达到高水平，则渗透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理”亦必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由此推论，这个团团转动的“理”不是单在平面上转动而已，乃是时时刻刻向上再向上地转动。它的转动必是螺旋式的，不是平面式的。反过来说，因为“理”的转动是螺旋式的，所以社会的发展也是螺旋式的。螺旋式者就是后一转动是前一转动的继续，不过比较高一级而已。

为了更详尽地讨论这个问题，特写了《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文，作为此书的主文，在文内，我把我国第二

个五年计划的轮廓说了一说，并从发展的观点重谈平衡理论和哲学思想，这就是把螺旋式——团团转的意思说得更详尽更切近实际一些。同时把英国经济学者凯恩斯氏的一般理论也批评了一番，因为他的一般理论很明显地是从“营救资本主义”的角度写出来的。我们认为把两种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理论这样排列起来，容易使读者看得出，我们的经济制度正在蓬勃生长，资本主义国家的，正在垂死挣扎，一是代表发展和生长，一是代表衰退和没落。这样，我国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得很突出。

螺旋式转动的意思在这里不妨再说一说。上列的图中有十个环节，我们决不能说这十个环节同时达到了平衡。有的是前进一步，有的是落后一步，是不平衡的（比如，1957年我国原材料工业的发展赶不上加工制造工业发展的需要，农业生产的发展赶不上轻、重工业发展的需要，等等），假定十个环节之中有两个由于种种原因落后了、停滞了，八个是前进的，正在走着上坡路，欣欣向荣地向前发展。无论何种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总不免产生比较先进和比较落后的两大类，这是极普通的现象，也是正常的现象。我们可以设想，千千万万的人不会是整齐划一的，总是有先进的，有中间的，有落后的。落后的人不觉得自己走慢了，反而要批评别人走快了。1956年7月到1957年5月，在农村中“好、多、快、省”不大讲了，“四十条”不大灵了，为什么呢？就是有些人拼命喊：“你们快了”，而跑在前面的人，有的也有些腿软了。劲头不足，这是一种右倾思想。因此各级党委都在批判右倾思想，劲头又起来了。加上农村的社会主义大辩论，机关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出现了政治高潮和生产高潮，所以劲头来得大，脚步更踏实，力量更加雄厚。如果我们把这股劲坚持下去，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连续奋斗五年，中国就要出现

更大的奇迹，因为落后的都跟上来了。领导得当，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

既然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按照平衡规律和按比例发展规律推动和帮助落后的赶上先进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又会出现新的比较先进的和新的比较落后的，接着又推动和帮助落后的前进，这样社会就可以不断向前发展。因此社会总是无时无刻不在动态中，我们不能以静态的眼光来看动态的事物。先进与落后总是会有的，不过在各个阶段中它们的含义是不同的，今日的落后环节不会永远是落后。问题是要看领导机关（计划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用什么方法来推动它们。平衡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是要看我们的这两个领导机构如何去应用它。他们制订的计划如能完全反映这两个规律，就是正确的。但是因为我们的经验还不足，统计资料还不够完备，所以制订出来的计划难免有时冒进些、有时保守些，不能完全反映这两个规律的要求。斯大林说得好：“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使我们的计划机关有可能去正确地计划社会生产。但是，不能把可能同现实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经济规律，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以完备的知识去应用它，必须制订出能完全反映这个规律的要求的计划。不能说我们的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都完全反映出这个经济规律的要求”。^① 所以要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就是帮助社会螺旋式地团团转，是领导机构重要责任之一。

程朱学派似乎把道德原则亦包括在“理”之中，我们的

①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6 至 7 页。

“理”当然也包括了道德，就是共产主义的道德，虽然共产主义的道德的含义与程朱派不同。因此，我们的经济活动或经济转动是螺旋式地上升的转动，我们的道德也一定是螺旋式地上升的道德。这可以从我的任何一个附属问题中看出来。譬如从《我国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文中，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工业合营以后有先进的一面，有落后的一面。先进的一面是公私合营以后生产一般提高了30%以上，产品质量有很大改进，职工情绪高涨，劳资纠纷减少，私方人员的积极性得到发挥，企业的经营管理方面也有所改进，绝大多数工厂在合营后改进了劳动条件和职工福利，有条件的工厂实行了劳动保险，有些工厂实行了劳动合同。此外，还提拔了工人干部，安排了私方人员，广大职工经过社会主义教育后，思想觉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以上是公私合营企业光明的一面。其黑暗的一面或落后的一面是：比如，在许多上海合营行业中都有些中小型合营企业的私方人员私自开设“自发工厂”。他们虽然参加了公私合营，但并没有很好的改造自己，至今仍留恋资本主义的道路，甚至不惜损害合营企业以满足私利。这些私设“自发工厂”的私方人员往往用隐蔽的方式用自己的亲属朋友出面经营。他们的产品质量低劣，售价也高，利润最高达十多倍。他们甚至采取贪污、盗窃等违法手段来获得资金、设备和原料，不惜搞垮公私合营企业。例如，旋转电机、石油机械、针织等行业发现部分私方人员私设“自发工厂”的机器设备，是他们在企业裁并改组的时候，故意隐匿下来的。私设“自发工厂”大都以高额工资拉拢部分在业工人，利用晚上来生产自己的产品，有的甚至要工人通宵干活。因此，有些合营厂出现了工人迟到、早退、旷工等劳动纪律松弛和劳动生产率、成品率下降的现象。有的合营厂私方人员甚至把

私人接受的订货混在合营企业的订货中，交给工人生产，非法剥削工人劳动。这些“自发工厂”现在已由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勒令停业，司法机关也依法逮捕了一些犯有严重违法行为的私方人员。以上是公私合营企业黑暗的一面、落后的一面，主要原因是政治思想教育做得还不够，好在这些企业是中小型企业，而且为数亦不很多，主管部门必须采取措施，处理这批“自发工厂”，并且赶快推动和帮助落后的赶上先进的。

这个从公私合营企业中抽出来的例子，足以证明一个道理，就是思想进步、立场稳定、一心一意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人民服务的人，其经济活动是比较高一级的，其道德观念也是比较高一级的。反之有些人思想落后、立场摇摆，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三心二意的，对资本主义还留恋不忘，专心为自己的利益打算，甚至不惜盗窃资财拒绝改造。这些人的行为卑鄙，其道德观念一定是很薄弱的。由此可知行为与道德是一物的两面，二者是相互依存的。从此可以断定道德也在“事之中”，决不是如程朱派所说的在事物之先，或在事物之外。我们相信离开了事物看不见道德。这个道德，如事物一样，亦必须螺旋式地向上发展。如不吾信，再看苏联。苏联自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来的40年间，已胜利地完成了五个五年计划，现在正在顺利地执行第六个五年计划。这些计划的执行，已经使苏联能向着共产主义迈进。在40年中它的生产发展的速度是惊人的。如按人口平均计算，1956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已比1913年增长了12倍，其中用于消费的占四分之三，积累占四分之一（中国消费占五分之四，积累只占五分之一）。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国民收入的一半以上是被少数剥削阶级攫为己有的。在这里已可以看出两种社会制度下道德观念之不同。由于广大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实行了完善的医

疗保健制度，苏联居民的平均寿命已经比革命前整整延长一倍。

从维持世界和平和提高人民福利的角度看，苏联建成世界上第一个原子能发电站，世界上最大的同步稳相加速器，第一架喷气式客机，第一枚洲际弹道火箭和第一个、第二个人造地球卫星。这一切都是为企图消灭残酷的战争、维持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利、打开人类知识的新领域，开辟科学发展的新纪元而努力的结果。人类征服大自然的无可限量的智慧，已由苏联人民作出了一个又一个光辉的榜样。这说明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是世界上最关心于把科学技术成就应用在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这一切都是崇高道德的表现，所以道德是与社会主义建设分不开的，如影之随形，一丝不差的，离开了实际，道德是不存在的，而道德的向上发展，与经济活动是一致的。

作 者

1957 年 11 月

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

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新出现的主要矛盾，是消费资料生产的发展赶不上生产资料生产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发展赶不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在生产资料的发展方面，原材料工业的发展又赶不上加工制造工业发展的需要。这样，在我国国民收入的积累同消费之间，也就出现了新的矛盾，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较慢，所增加的国民收入大部分只能用于积累。此后应该贯彻执行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并举的方针，加速农业的发展，积极地发展原材料工业。要发展农业必须增加投资，拟把国家的投资（包括发展农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农业放款、农业事业费开支）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本身的投资结合起来考虑，实行统一规划，适当安排，才能更好地发挥投资的效果。农业生产合作社本身的投资，在发展生产和社员生活逐步改善的基础上，在不断地增加。如何使这笔资金用得妥当，也是需要很好地研究的问题。而投资的对象是：开荒、兴修水利、排涝、化学肥料。我认为大规模的开荒问题一时谈不到，现在应该首先把重点放在土壤肥沃、收获量高以及交通方便、接近工业基地的农业地区。这样不仅投资的经济效果很大，垦荒工作也容易进行，而且便于把工业的发展和农业的发展结合起来。至于水利与排涝可并为一项，化学肥料虽可以独成一

项，但可以与水利并为一谈，因为要发展农业生产，必须至少有两个条件：一是水，二是肥。必须有水施肥才有用。河南省孟县缙村农业社实行“五水三肥”，亩产小麦 1 125 斤。只要给它喝五次水，上三次肥料，它就给你产 1 125 斤小麦。全国小麦平均亩产 100 多斤，与此相比差十倍。如果水利问题解决了，小麦就能增产十倍，农业增产的潜力是很大的。反之，如果没有水利设备，遇到旱灾或者水灾，再多肥料也不能希望增产。北方农民缺乏施肥习惯，与水利条件太差对产量不易提高是有关系的。我国工程技术落后，对于水旱灾害尚无控制把握；同时因工业落后，国家尚不能供应大量化学肥料，凡此皆农业生产比较落后之主要原因。因此我把水利与化学肥料并为一谈。

一、要加速农业发展必须认识水利与肥料的重要性

要加速农业发展，只有增加农业单位面积产量，这就要加速发展化学肥料厂和兴修水利。现在先来谈谈兴修水利与排涝。为了解除长江洪涝灾害，有人建议要早日建设四川三峡这样巨大的工程，以此来防御长江的千年一遇的非常洪水。这个工程完工后；不仅可以控制长江洪水的主要来源，还可以建成世界上最大的超巨型水电站，并使万吨海轮直通重庆。但所需的物力财力非常巨大（建设水库发电站以及四周围的企业工厂至少需花六七百亿到一千亿以上的资金），非我国近期财政力量所能负担；不仅投资数目太大，而所需的时间亦太长；据估计至少要经过五年设计十年施工才能把三峡工程建设完成。在此十五年的过程中，自然不能专靠三峡水库来解决长江的洪涝问题。长江的洪涝灾害是很频繁的，平均五六年内就可能发生一次比较大的洪水。为解除